

李澤厚自五十年代起嶄露頭角，作者形容李的哲學歷程本是一部現代中國思想史，翻閱其中，既能看見種種美學論述，也能目睹昔日翻天覆地的政治運動下，其對五四與文革的一再思索。李曾認為知識分子的使命在於拯救被打斷的啟蒙議程，面對幽暗時代，啟蒙觀念仍能引起影響嗎？

——編者

世間再無李澤厚

涂航

從馬克思回到康德

這是一個波雲詭譎的大時代：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民粹主義死灰復燃，冷戰的幽靈徘徊不去，民族國家的圖騰捲土重來。與此同時，階層固化，貧富不均，人工智能的誘惑，全球變暖的末世識言，以及吹捧另類真相的詛言、流言與謠言——我們時代的生死愛欲早已不是「後革命」、「新啟蒙」這些凌空蹈虛的歷史名詞可以囊括的了。在這個「九九六」工作制與共同富裕對決的時刻，一代哲人李澤厚在科羅拉多州波爾多小鎮溘然長逝，帶走了一個人文主義的純真年代。從七十

年代末起，李澤厚的名字，連着「回到康德」、「實理性」、「樂感文化」、「巫史傳統」以及「情本體」等等帶有他獨特生命激情的理論術語，持續迴蕩在華人社會的文化與哲學爭鳴之中，同隨着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而產生的諸多學術思潮碰撞出火花。驀然回首，繁華褪盡，從故鄉湖南到洛基山腳，從美學大辯論到康德啟蒙，從流亡海外到告別革命，李澤厚的哲學歷程本身就是一部現代中國思想史，見證了知青一代徘徊於思與信、革命與啟蒙、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艱難與不易。

一九五六年，大陸文藝界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美學大辯論」，審美的主觀與客觀之爭背後是山雨欲來的政治批判。來自湖南長沙的青年美學家李澤厚嶄露頭角，引經據典，既反對朱光潛的唯心主義，又批判蔡儀的機械唯物主義美學正朔，最終形成一套對美與人的本質相互關聯的獨特看法。大躍進至文革期間，他被多次下放勞動，從太行山區的農村到河南信陽的「五七幹校」，虛無躁動的時代氣氛和艱難的物質條件卻無法磨滅他的學術熱情：「我在行李中偷偷放了本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閱讀時上面放一本《毛澤東選集》。下面是康德，還偷偷做些筆記。」一九七九年，地震棚裏寫就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正式出版，隨即引發青年學子的關注。在這本影響廣泛的著作中，李澤厚試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改造康德的唯心主義學說，將抽象的啟蒙理性歷史化為具體的中國問題，繁複縝密的哲學推演之中暗暗隱含了他對文革成因的歷史反思。以一言蔽之，李澤厚的微言大義「回到康德」，就是要從馬克思的宏大敘事回到康德的倫理規範，從



《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出版後，隨即引發青年學子的關注。（資料圖片）

超凡脫俗的革命史詩回到日常生活的飲食男女，回到常態所需要的「吃飯哲學」與人間情懷。

將苦悶轉化為對美的熾熱訴求

與高屋建瓴的哲學反思相輔相成的是李澤厚八十年代的美學論述。從一九八〇年起，隨着朦朧詩、傷痕文學、「異化」討論、星星美展的相繼湧現，人的覺醒成為這一時期的文藝主題。李澤厚在〈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中如此形容人道主義思潮所彰顯的時代精神：「一個造神造英雄來統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傷、憧憬、迷茫、歎息和歡樂……」他在〈畫廊談美〉中為方興未艾的現代主義藝術辯護：「在那些變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型中，不也正好是經歷了十年動亂，看遍了社會上、下層各種悲慘和陰暗，嘗過了造反、奪權、派

仗、武鬥、插隊、待業種種酸甜苦辣的破碎心靈的對應物嗎？」誠哉斯言，親歷以醜為美、指鹿為馬之幽暗時代的一代中國學子，把政治上的苦悶、思想上的彷徨以及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幽怨情感轉化為對美的熾熱訴求：什麼是人性之美？什麼是美與醜的界限？如何確證感性血肉的個體主義？在長期的壓抑之後，青年學子開始在美學論述中尋找思想靈感。從朱光潛的《談美書簡》以及宗白華的《美學散步》到李著《美的歷程》，華夏美學的經典議題——原始情欲、感性與理性、崇高與庸常、美的社會性與自然性——一度擺脫了佶屈聱牙的玄學論爭，而是關乎飲食男女、聲光色影，喚起了經歷無數苦難的青年一代對告別烏托邦、重建人性理想的由衷嚮往。

在這一時期的美學著作中，李澤厚從遠古圖騰中的龍飛鳳舞開始，帶領讀者跨越千年的歷史歲月，重訪一個又一個「有意味」的美學形式：魏晉風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韻外之致……這些各異其趣的美學意象背後，流溢着李澤厚對五四美育論的批判性轉化。「美育」一詞源自德國詩人席勒對美感教育對塑造人性自由的美好期許。從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說〉到張競生的全盤美治主義，五四以降

的中國美學家無一不強調美學所獨具的熏陶情感之功。李澤厚則另闢蹊徑，合儒家的禮樂傳統與現代漢語審美主義為一體，闡述華夏美學的「樂感文化」。他認為，不同於基督教傳統中超越性的罪感文化，儒學情感論把培育和塑造人性本身作為世俗社會的最高價值。可見，面對禮樂崩壞的時代危機，李澤厚的解決渠道是回到儒家現世主義傳統，以「此世之情」開啟「把超越建立在此岸人際和感性世界中」的華夏美學之路。

一九八六年，李澤厚為《走向未來》創刊號撰寫〈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試圖通過回溯五四時代的兩大傳統——個性解放與民族危機——來回應當時日益激進化的文化反思運動。現代中國面臨強敵環伺、國破家亡的民族危機，屢屢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要求個人流血犧牲，直至救亡壓倒啟蒙，積重難返。文末，李澤厚大聲呼籲當代學人應當「創造性地轉化」這兩大五四傳統，完成知識先輩未盡的事業。只可惜，八十年代後半葉的知識界逐漸走向意識形態的兩極化。對於青年弄潮兒來說，李澤厚古板的啟蒙議程與馬列主義乃是一丘之貉，一樣企圖為了「大我」而壓抑「小我」。青年學術黑馬劉曉波振臂一呼，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

化，以張狂的文辭宣洩年輕一代的憤怒與抵抗，將李澤厚貶為試圖「復活孔子」的前朝遺老。正統左派則批判李澤厚「崇尚個體，貶低總體」，迎合西方普世價值。左右之爭本是共和國的政治常態，然而當時的人們卻渾然不覺，日漸政治化的派系論戰中已然滲透着你死我活的危險信息。

流亡之路開啟哲學轉向

歷史沒有假設，人生無法重頭再來。一九九二年，李澤厚遠走海外，由此開始第二人生。一如他的摯友劉再復先生寫下的詩行：「江河流向大海，大海又流向何方？大海流向漂泊者的眼裏。」耳順之年背井離鄉，遠走天涯，一個甲子之後重頭再來，這其中的輾轉反側、慘痛與淒涼、勇氣與信念，哪裏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然而，唐君毅先生早以「花果飄零，靈根自植」一說，來形容中華文化在海外的撒播：華人移民所飄零之處，便有儒家文明生根落地的可能。李澤厚在洛基山腳安家之後，仍然筆耕不輟，與劉再復合著《告別革命》一書，大聲宣稱知識分子的使命在於拯救被打斷的啟蒙議程。在《說巫史傳統》中，他回眸孔子之前的上古時代，考察巫君合一、政教合一的原始巫術活動如何擺脫鬼神崇拜，成為先秦理性精

神的源泉所在。自三皇五帝到周公制禮作樂，經過「由巫到禮，釋禮歸仁」的歷史演化，巫的宗教神秘主義最終讓位於孔門仁學的現實主義理性。

不僅如此，流亡之路還開啟了李澤厚的哲學轉向。九十年代伊始，在後解構、新自由等理論大說在大陸知識界掀起一陣陣思想波瀾之際，李澤厚卻一度淡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政治論戰，開始以「新感性」、「情本體」等術語激活美學的批判潛能，重思啟蒙與救亡之情之向度。正如學者王德威所言，啟蒙與革命的恢弘史詩之所以能夠摧枯拉朽，恰恰因為內裏「含蘊着一個溫柔的、『他心直指我心』的烏托邦渴望」。同理，李澤厚的情本體融康德美學、馬克思主義人性論與儒家樂感文化為一爐，化繁為簡，試圖在「情」、「美」、「度」之間確證社會性道德規範，為價值混亂的市場經濟時代尋找一種安心立命的根基。在學術研究日益精細瑣碎化的華語世界裏，我們已經很難看到像李澤厚這樣執着熾熱的華夏美學的捍衛者了。卸去了啟蒙領袖的光環，去國之後的哲學家以其獨樹一幟的儒學情感論再出發，將最終存在寄託於「這人類化了的具有歷史積澱成果的流動着的情感本身」，來面對這無言以對的民族歷史。

也正是抱着這樣的哲學視野，李澤厚在全球災難時刻卻仍然不改他的啟蒙樂觀主義情懷。二〇二〇年春天，由於特朗普政府消極抗疫，民粹主義四下蔓延，導致哲學家所在的波爾多小鎮的死亡人數劇增。儘管如此，在信奉「樂感文化」、「永久和平」的李看來，「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總趨勢……疫情有可能讓全球化推遲二三十年。但對人類歷史來說，算不了什麼」。倫理與歷史總難免二律背反，「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人間悲劇終究無法阻擋普世和平之大勢。然而，在這個政治掛帥、經濟至上的世界裏，我們不由得懷疑：啟蒙的觀念還會對這個幽暗混亂的時代產生影響嗎？誠然，滄海桑田之後，「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陳平原語）的人文主義時代已成往昔。天地玄黃之際，筆者不禁想起，在《美的歷程》的結語處，作者發出這樣的感慨：「俱往矣。然而，美的歷程卻是指向未來的。」走到人生邊上，面對生命盡頭無涯無際的深淵，李澤厚不得不告別讀者，但是他從千年的華夏美學之旅中淬煉出來的有情的聲音卻不會被人遺忘。任憑時間流淌，風雲變幻，美的歷程沒有終點。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